

# 何为现代性危机

——从阿伦特、施特劳斯、沃格林说起

欧阳火亮

(四川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成都 610065)

**摘要:**现代性危机目前成为了西方学术界一个公认的命题,如何理解、解释和解决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危机却有不同答案。阿伦特认为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危机来源于现代社会中权威的丧失,我们无法回到过去,只能着眼未来。施特劳斯试图寻找一种介于理性和精神之间的对立的解释,并探析这种解释对于政治生活的意义,带有明显的政治哲学思辨的色彩。沃格林从宗教的视角阐述了西方现代性危机,将西方现代性危机溯源到了中世纪的灵知主义,认为现代人的精神无所皈依才是危机的本质。要解决西方现代性危机,就必须思考其产生的根源,给予不同的解决方案。以复古的心态看待现代性并不利于西方社会现代性危机的消除,古代的经验或手段或许具有借鉴意义,却无法提供直接的解决方案,更不能直接适用于现代。因此,尊重和接纳不同的选择,或许是西方国家现代性危机可以得到解决的方案。

**关键词:**现代性;现代性危机;极权主义;古今之变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1)06-0051-08

## 引言

西方思想家们曾为现代西方社会提供了一个看似极具吸引力的现代性方案——结合了市场经济的物质繁荣和自由民主的政治文化。然而,危机也真实地存在于西方社会现代性本身之中。危机(Crise)源于希腊语“Krinéin”,意味着危险和决定性的判断后果。在西方现代社会中,所谓的“民主”似乎成为唯一理想的制度。与此同时,西方现代社会构建于国家与社会、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分离基础上的个人自由和幸福,似乎成了西方人的唯一追求。古代政治社会关注人的自身改善和精神归宿,现代政治社会则建立在价值多元的基础之上。西方现代社会所形成的机制剥离了公民的思考能力,如自由主义,既承认政治是罪恶的,又认为政治的恶是必要的。诸如此类,西方社会现代思想的纷繁复杂和无尽的放矢,迫使专家们不得不思考政治的意义,于是政治哲学的思考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各种各样的学说由此产生。对于政治,人必须知道什么是正义、服从、自由和裁断,然

而现代人根本难以明了正义、服从、自由和裁断的标准,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危机也由此产生<sup>[1]</sup>。

政治思想史上所认定的西方现代社会,可以将其定义为17世纪英国革命以来,由霍布斯率先阐述的个人主义式自由社会。西方现代社会实质上是一个商业社会,自由、平等、秩序和安全的要求均来源于这个商业社会。这和古代社会要求秩序、精神归宿和公民美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就是形成了所谓的古今之别。这个商业社会带来的转变是:人们不再询问一个人是否可以或者应该调整自我去适应社会环境,而是孜孜以求地找寻什么是适应社会最有效的方法和手段。这个西方盛行的现代性社会概念也并不具备完整的现代含义,西方社会完整意义上的现代是指“根据法国和英国的17和18世纪构想出来的现代;它已经吸收了世俗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信条”<sup>[2]217</sup>。商业社会的现代性可以追溯到更远的时代,如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因为西方对现代性的认识不仅使得政治哲学本身概念解体,而且已经没落到非常严重的地步。

收稿日期:2021-05-26

基金项目: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家治理理论研究”(17JJD810001)

作者简介:欧阳火亮(1988—),男,湖南邵阳人,法学博士,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在许多人看来,西方社会所面临的现代性危机是全方位的,如理性的危机、国家的危机和“共和的危机”。在面对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和进入新世纪以来的恐怖主义、民粹主义和新的各种形式的专制主义,如果还视若无睹,这不得不让人感觉非常的怪异。人类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对生命的定义是什么?在群体之中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在个人主义泛滥的今天,科学技术到底给我们什么带来了什么?国家是最终的人类形态吗?这些问题引发了人们对西方社会现代性危机的思考。许多思想家试图回答这一问题,他们的解释在不同的层面上呈现出一定的合理性,但也让人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现代性危机时有些难以适从。因此,很有必要全面地对西方社会现代性危机进行阐述和作出回应,以厘清西方社会现代性危机的核心要素,全面地理解和对待西方国家出现的所谓现代性危机。

### 一、三位思想家的基本思想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可以说是阐述西方社会现代性危机最为知名的思想家之一,其代表性的作品有《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 of Totalitarianism*)、《共和的危机》(*Crises of the Republic*)等。阿伦特的核心要点是:西方社会现代性危机来源于现代社会中权威的丧失,然而我们无法回到过去,只能着眼未来。

阿伦特从现象学的角度重构了政治理论,深刻地展现了西方社会现代性危机的核心要素。阿伦特认为,西方社会现代性危机是一种现实政治的危机。阿伦特用现象学的方法研究了西方现代社会中特有的危机,在现代西方社会,权力的发展导致了权威的衰落,而暴力的发展又导致了权力的消失。当权力也消失时,暴力就会替代权力和权威,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危机就出现了。权威的丧失是西方现代政治最典型的特征。西方现代政治自诩追求平等,认为威权政府和等级结构是人类已有的政府组织形式中最不平等的一种,因而它们不为西方现代所谓的“自由平等”的观念所包容。实际上,所有西方已有的被认为是平等主义的政府都是极端的:要么极端自由,要么都没有自由。与平等主义危机相类似的是官僚制带来的危机。官僚系统的政治统治甚至更为可怕,“在此之中,没有

人可以被认为是负责的,无论是一个人还是最优秀的人,也无论是少数人还是多数人”<sup>[3]103</sup>。阿伦特将官僚政治斥之为“无人统治”。

“危机要求整个共同体看到它,并且寄生于共同体之中:这是危机本身的力量,它所显露的力量。”<sup>[4]78</sup>现代性思想越是一种开端,那么任何的改变就会触动本已存在危机的秩序,因为现代理性自身已经无力去建立或者承认一种秩序的正当性。西方社会要走出现代性危机就必须面对现时代处境下的特殊政治事件,“对于懂得思考政治事件的人来说,政治事件以同样的方式照亮了其本身的过去,只有大的思想决定本身可以把持亮光,照亮开端之后的延续以及终结之后的遗产”<sup>[4]156</sup>。人本身的尺度就是思想判断的尺度,因为现实中合法的权威是所有的开端都可能成为权威。由此,开端成为了阿伦特解决西方社会现代性危机的一种视角乃至是方案,“我们能自由地改变世界,并且在它之中开创新的事物”<sup>[3]5</sup>。

虽然阿伦特的许多观点都是古典共和主义的,但也并非意味着阿伦特就是一个纯粹的复古主义者。实际上,阿伦特反对将古代社会过分浪漫化、理想化,毕竟,过去的已经不再存在。处理西方社会现代性危机尤其是极权主义,不能指望回归上帝,更不能希冀回到过去。过去的古代社会,有其存在的独特的思想意识基础,现代已经完全不同于古代了。西方社会产生的现代性危机,来源于人性中本就固有的东西,这一点应该成为思考和解决现代性危机的立足点。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擅长于批判历史主义以阐述现代性危机。他试图寻找一种介于理性和精神之间的解释,并探析这种解释对于政治生活的意义,带有明显的政治哲学思辨的色彩。

施特劳斯认为,西方现代性危机诞生于现代早期政治哲学家如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等人抛弃传统政治哲学的时刻,是一种整个西方世界思想和理性的危机。施特劳斯用回归古典哲学的方式,思考了整个现代性危机。施特劳斯甚至认为西方所谓的“现代性”本身就是危机:通过提出普遍性和永恒性的问题,以促使政治哲学回归古典式的思考——可以发现最好的政治

模式。古典哲学并不传授任何具有普世性的教义,也不追求任何确定的答案,但是提供关于永恒性问题的思考,“古典政治哲学就其原义而言是自由主义的”<sup>[5]31</sup>。在施特劳斯看来,历史主义背叛了捍卫永恒信仰的初衷,通过否认普世价值摧毁了超越价值,剩下了一个纯粹主观的、个人自由的选择标准,并最终走向了历史虚无主义。历史告诉我们一个观念或者一项权力从产生、发展、繁荣到消亡的过程,但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过程是否是正确的或者是正义的。历史主义告诉人类的是人属于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然而并没有真正的进步,只有具体的历史形态和历史环境的转变。历史主义起源于现代传统中认为的真正的知识只属于有限的认知范围之中这一思想。但是这些无法解释在法国大革命之前,也就是历史主义兴起之前,为什么伟大的思想家们并没有耗费足够的笔墨去关注历史。历史主义本身也只是人类生活中的一种短暂的思想现象,只具有暂时的正确性或者是根本不具有正确性。18世纪政治史的发展促进了历史主义的诞生,即历史主义是现代自然权利危机的解构:哲学被彻底政治化了,从而导致了哲学的危机。哲学是为了探讨人,是为了探析永恒的秩序而被人性化,但是从17世纪开始,哲学成为了一种工具。

自由的获得来自于对自然的重新认识以及个人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的重新获得,从而重新找到思考和使用真理的理由。西方社会现代性的危机归根到底是价值判断的危机,而且是对最本质价值的质疑的漠不关心导致的。关键是判断的可能性如何:“危机总是先是判断的危机,处于危机之中这一姿态对于实际走出危机,是必不可少的必备条件。”<sup>[4]63</sup>判断是绝对的,是一种评估善恶、正义非正义、正当非正当的能力。批判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并回归到古典哲学,就是施特劳斯给现代性危机开出的药方。自然权利出现的本质条件是正确的或者错误的观念的多样性,人类自由秩序的本质是善与恶的区分,捍卫自然权利就是捍卫人性本身。施特劳斯的思考回到了人的理性能力这个现代所推崇的概念本身,当人失去了对未来的信心,人性所具有的感知就会出现危机。施特劳斯推崇自然权利绝对的真理,以引导人们走出价值判断的危机,从而在自然权利和人性本身之间

建立起了联系。于是,理性成为了唯一的权威。

相比于阿伦特的共和主义视角和施特劳斯的哲学性视角,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看待现代性危机的方式有所不同。沃格林从宗教的视角阐述了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危机,并将现代性危机归因于现代人的精神的无所皈依。

沃格林将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危机溯源到了中世纪的灵知主义(Gnosticism),即被视为异端的世俗主义宗教观,“现代性的本质是灵知主义的兴起”<sup>[6]126</sup>。沃格林划分了两种人的生活:在精神上的情感是神圣帝国、教会和终末论思想,在身体上的情感是世俗、此世和内在的思想。用康德主义(Kantianism)的语言来说,即“超越”与“内在”。“内在”的政治思想即现代性的政治思想。政治生活要么可以超越自身而追寻超越价值,要么变成了操控精神需要的工具。西方极权主义的起源并非如阿伦特所认为的是现代大众的精神疾病,而是一种现代性危机,是精神和世俗之间的背离,“真正的分界线不是在自由主义者和极权主义者之间,而是在宗教和哲学的先验论者与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宗派论者之间”<sup>[7]255</sup>。西方现代大众最大的危险是自我利益和归属感的缺失。在沃格林的语境中,我们自出生肇始就生长于斯的环境就是政治领域,我们在其中进行日常活动并构成了人生的整体,秩序是持续生存的前提条件。这个政治领域是变动不居的,并不存在特定的政治制度,但人不同,人是带有整体性的,“人在原则上是与其人格之整体参与到政治唤醒之中的,而且,一个共同体的所有文明创造物都必定带有全部整体的印记”<sup>[8]114</sup>。决定着这种“政治唤醒”的是人对于特定的历史情境或者制度安排的正义与否的接受或者反对。特定的认可或者反对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消失,但是“政治唤醒”所留下的“观念”则会在文字或者文明中保留下来。沃格林利用符号分析法写出的皇皇巨著《政治观念史稿》(*History of Politic Idea*)阐释了在政治领域中,观念和现实的“政治唤醒”之间的冲突是西方现代性危机产生的根源之一。教会和帝国二者划分了世俗与精神两个不同的权力单元,二者又结合于同一个人的身上,这种同一性使得教会具有普世性的精神权威,带有终末论的色彩。生存具备符号性的制度压制了日常生活中的制度,使得政治帝国在中世纪做出了妥协,

“只有在中世纪之后,才有可能使代表着帝国政治与宗教组织的各种符号之间的争论正当化”<sup>[8]10</sup>。世俗力量在中世纪后期的兴起,带来的是政治理论的两个新的任务:“(1)塑造新力量领域的政治秩序;(2)使新秩序适合于旧的、并未停止存在的基督教秩序。”<sup>[8]117</sup> 在新秩序兴起的历史进程中,政治符号的演变经历了从精神——世俗——现代的衰退性演变,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危机正产生于这种演变之中。在沃格林看来,现代性的到来肇始于代表属于世俗的权威和属于精神的权威二者之间的断裂,促生了西方现代政治思想的觉醒和更具颠覆性的宗教改革,产生了国家和教会两个相对自治的领域。属灵的现实主义的立场与行动主义神秘论者的立场之间的冲突刻画出了新旧世界之间问题的本质:(1)对变体世界的信念不能被置于历史实存之中;(2)在行动主义者们的省思中,两个世界之间的暴力碰撞造成了两个世界之间划时代的大灾难;(3)“终末论”暴力超越于善恶,争取光明世界的战争是将黑暗势力逐出宇宙的超越性圣灵运作,那么信徒们会不可避免地沉溺于灭绝的彻底性之中,而这种灭绝在现实层面上呈现为兽性与暴行;(4)人性变化和历史变体的展开不在人类行动范围之内,因此也就并非在手段——目的的理性关联中运行;(5)虚无主义的根源之一是行动主义神秘主义者扫除邪恶势力之意愿与政治家不得不出让让步之实存之间的张力<sup>[8]201-206</sup>。基于这一认知,沃格林直接将纳粹主义这一极权主义斥之为“缺乏人性、全无良知”的恐怖活动,并认为其来源于“奥秘主义和动物攻击性的合流”,是在历史与政治层面上“最为彻底的人类欲望足以得到满足,不仅逃脱道德与法律的节制,而且秉持着臻于极致的信念——最为丑恶的罪行不过是那场将世界从邪恶中解救而出之神圣肇划的手段而已”<sup>[8]204</sup>。

在《政治观念史稿》卷五中,沃格林探讨了宗教与西方社会现代性兴起之间的关联。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危机尤其是极权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宗教化的现象,即神化世俗秩序。人同时拥有精神和世俗两个维度,但是现代灵知主义否认了精神的维度,把人类自己置于世界的中心并成为所有意义和秩序的源泉,“拒绝了超越性的秩序之源,人现在就有力量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来创造现时秩序”<sup>[8]英文版编者导言,5</sup>。宗派

主义的精神导致了教会的分裂,才产生了现代的情感和态度的问题。极权主义成为人们看待现代文明的透视镜,“人的启示”终究无法完全取代“上帝启示”,现代世界无可置疑的危机就是精神秩序的危机。

以上三人就是阐述西方社会现代性危机的主要思想家,也可以说是三个流派的代表。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关于西方社会现代性危机的论述,但大体遵循了上述三种思路。在持有西方社会现代性危机观念的人看来,西方社会现代性危机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解决这一危机的关键是找到其原因所在。

## 二、西方社会现代性危机产生的原因及其可能的解决办法

西方社会现代性危机产生的原因,首先可以追溯到对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反思。极权主义思想可以追溯到18世纪,和欧洲传统秩序的衰退有着直接的联系<sup>[9]4</sup>。极权主义内部并不具有一致性,而是有着不同的区分:源自唯意志论和经验主义的悲观主义哲学的法西斯主义,这是一种政治上的极权主义;源自迷信实力的乐观主义哲学的纳粹主义,这是一种种族极权主义<sup>[7]37-38</sup>。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不相信上帝,都迷信国家,以及都是无神论。罗宾·乔治·柯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不同形式的极权主义,并阐述了极权主义产生的原因。柯林武德研究了战争的危险性,并将现代性危机定义为一场理念的冲突:“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构成了对文明的反叛,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抵制它们。”<sup>[10]增补版导言,2</sup> 这种背叛性在于,极权主义在不同的层面显示了现代对传统的叛离。社会极权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反而刺激了人类中心主义,试图寻找一种新的普适性反而失去了理性和信仰。种族极权主义反对理性、反对智慧、反对真理,这种反对的力量来自底层,具有严重的残暴性和野蛮性,需要智慧和真理来引导和改造。真正的善根源于智慧。种族化的极权主义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催眠,使得现代人步入一种无意识的精神障碍之中,从而被剥夺了思考能力。其后果是:现代人生活的世界模式和个人经验脱节,个人生活在一个越来越迷茫的时代,只能诉诸于集体的非理性之中来寻找安全

感。而自由主义假设的人性善,在面对极权主义的时候几乎没有应对的方案,因为自由主义不承认来自人类底层的力量会反对理性和智慧,并否认人类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失去了古已有之的内部秩序。自由主义过度追求平等和人类本性的思想,使得极权主义获得了生长的土壤,“一切现存的传统、既有的机构和社会的设置都要推倒重来、重新塑造,唯一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们全部的权利和自由,把他们从一切束缚中解放出来”<sup>[9]259</sup>。

西方社会现代性危机产生的原因,其次可以追溯到宗教的没落,尤其是政教分离,也就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政治的祛魅化。自罗马帝国衰落以来,城邦作为最高形式的政治组织的观念被人们所否定,取而代之的是宗教的教会成为人世间最高形式的组织机构,这一期间,宗教组织高于政治组织,精神统治世俗的秩序基本得以维持。到了15-16世纪,伴随着西方现代性的宗教改革,神学偏离了中世纪的观念,教会的权力被一种新的政治权力所替代,即现代国家。现代国家承接了人们对于上帝或者对于神的信仰。然而,西方现代社会的人们已经认为自己从迷信带来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而使得信仰成为了一种稀有乃至可笑之物。于是在最先产生现代国家的西欧,个人与人类、与上帝的不和谐成为了矛盾的中心,在精神上,个人开始无可适从。因此,许多将西方社会现代性危机归咎于宗教没落的学者,试图通过重建人与上帝的关系来解决这一问题。雅克·马里坦(Jaques Maritain)就认为基督教道德的全面觉醒可以治疗西方现代性的弊病。马里坦认为西方现代社会的缺陷就是把人二分化,即割裂了精神是世俗在人身上的一体性,“这样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只有通过宗教道德的革新才能解决”<sup>[7]42</sup>。因而,呼唤现代的自由和创造力、追寻现代的精神力量和社会复兴、探索超越国界和历史无尽的爱,精神意义的回归成为医治宗教没落导致的西方现代性危机的合理解决办法。

西方社会现代性危机产生的原因,再次可以追溯到科学技术进步观念的盛行,特别是将科学标准引入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的意图和行为。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的现象是技术人员的地位超过了艺术家,物质享受成为了生活的最高追求。对美、人生和宇宙的探

索似乎成了极少数人的追求,技术和科学家开始统治世界,普通人的思考和思辨能力被严重剥夺。人的理性被所谓的科学标准所剥夺,过度地迷信工业化和市场化能给个人带来自我价值乃至幸福的实现。对政治和社会而言,道德不再是西方社会价值追求所在,自由社会普遍开始缺乏宽容和忍让,而进入了精确的利益计算时代。政治学家和道德学家变得同斤斤计较的经济学家一样,将市场看作是万能钥匙,试图去打开人类所有的幸福之门,包括对精神宇宙的探索之门,而人则越来越动物化了。在越来越强调生存与发展的地方,物质成为了西方社会唯一的诉求,社会具有的道德性和人所具有的思考能力被贬斥,技术和科学标准成为其唯一的替代品。现代科学的问题是研究的手段和方法成为了终极标准,抽象真理的概念被束之高阁乃至弃置一旁,可能的后果是随大流的思想无处不在,想法的普遍性成为了融入集体的必备要素。西方社会公民的智慧和思维能力被剥夺,却被物质不断鼓动人的本性和情绪,这种试图诉诸于人为控制全过程的理论成为了西方现代社会考评一切探索的标准。现代知识和思想的科学化,最终导致的是机械唯物主义和虚无主义,人类通过对科学的自由探索却丢弃了思考的自由寻找。因此,许多反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利于敦风化俗”的学者,试图通过回归传统文化甚至是反智主义来寻求解决西方社会现代性危机的方案。

西方社会现代性危机产生的原因,复次可以追溯到片面进步主义史观带来的盲目信仰。西欧在17世纪将进步看作是知识的积累,到了18世纪进步就成了“人类的教化”的代名词,“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是不断进步的这种观念在17世纪之前还不为人知,18世纪时发展成为了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到了19世纪则成了几乎普遍接受的信条”<sup>[3]95</sup>。片面进步主义似乎提供了一种引导未来的安全感,解决了人类面对未来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幻觉。随着历史进入现代,尤其是笛卡尔之后,人类被许诺在人世得到幸福,实际上历史的发展却大相径庭。在历史事件的具体逻辑里,历史的教义和理念在内部逻辑上保持了一种实实在在的进步,然而在人类社会环境中,历史的教义和理念则又被历史的偶然性和自主性所主导。人类的信仰和理性其实本

聚集于人身上,然而人类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却使得这种理念趋于消失。理性受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威胁,历史将人置于权力和过去的虚幻的历史之下,盲目相信进步和未来加重了这一循环,切断了理性与精神层面的交流,使得人忘却了精神需求的重要性,变成了彻底的“动物”。能够从历史身上继承来的,本只有社会赖以运行的现代秩序。片面进步主义最早是一种人文主义,然而正如马里坦所感慨的,“经典人文主义认为现代社会用一种恶的方式来追求一种善的结果。因此,它放弃了对人类真正价值的探索”<sup>[7]35-36</sup>。进步的现代社会认为人类是封闭而孤立的。历史背后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力量,但是本质上都是物质在不断丰富技术不断发展的同时,信仰和精神不断地被解构和否定。永恒的生命和现世的创造力、物质生产力,都是人可以追求的,二者统一于人类身上。人类的知识技术确实是在进步,但这并不代表人本身是进步的。片面进步主义导致了普遍的西方社会现代危机。因此,追寻人类尊严的历史观,在人类道德和社会秩序中重现更为深刻和全面的个人尊严,找回人自己,成为解决西方社会现代危机必须进行的思考。

西方社会现代性危机产生的原因,从次可以追溯到对古今之变的反思。当政治学者将自己定义为探索“谁、什么时候、怎样得到”这类“物质成果分配”的问题,而不再是探索“美好生活、发现和追逐有价值的善”这一类政治生活的终极问题的时候,西方社会现代性危机就产生了。现代的道德和精神混乱导致了信仰的缺失,人在不断地探寻“自己是谁,从哪儿来”的问题的同时就已经丧失了“到哪儿去或者还有哪儿可以去”的终极追寻。格伦·廷德(Glenn Tinder)等学者就认为西方现代人不再追寻永恒性的政治问题,人性思考的缺失造成了文明的崩溃和西方社会现代性的危机。诸如恐怖主义、民粹主义乃至极权主义的存在,现代世界已经和古代世界完全不同,但是并不意味着现代世界更加的安全。毁灭性武器技术的研发使得小国可以和大国平起平坐,秩序正变得越来越成为稀有之物,而政治在技术的怂恿下,其隐含的力量博弈的一面越来越显露出狰狞的面目。更为令人担忧的是现代国家概念的危机。古今之变后,现代国家的概念涵括的范围越来越大,直接

侵入到了公民的个人生活当中,国家不再局限于其政治职能领域,反过来,国家对社会和个人领域的渗透也导致了个人和社会深入到国家领域之中。这种互相影响的状况导致了西方现代国家的危机,正如贾恩弗朗哥·波奇(Gianfranco Poggi)所指出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的现代国家丧失了“早期所确立的国家的两个独特性特征——也是其优越性所在——即国家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政治权力中心的特征:统一和理性”<sup>[11]186</sup>。西方现代国家的过度扩张,国家内部被分裂成诸多的组织,组织之间彼此竞争,而在国家的外部,个人和国家相互渗透,国家的职能不再单一化,国家也不再是最高权力的绝对统一体,反而成为了工具。在此种古今之变下,如何思考在缩小国家权力范围的同时提高国家供给公共产品的能力,成为西方政治学家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西方社会现代性危机产生的原因,最后还可以追溯到西方现代国家不再追求正义而是希图和平这一目标的终极性。虽然西方现代国家的奠基一般都会归因于英国伟大的思想家霍布斯,但是国家成为最高的人类组织,在德国人弗里德里希(Carl J. Friedrich)看来却是“亚里士多德思想的遗产”<sup>[7]55</sup>。亚里士多德谈论的最高政治组织,其目的是实现最高的善,其建立基础是包含正义、宗教和所有方面原则的。霍布斯不赞同亚里士多德,因为在霍布斯眼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是黑暗的哲学,国家的建立并非为了所谓的最高善,而是保障基本的安全和秩序。在中世纪的宪政主义理论中,只有在一个政府和一个国王的前提下,estate、etat、state三者的意义才能重合。西方现代国家的概念虽然是由让·博丹(Jean Bodin)提出的,但是使国家的概念发扬光大和深化的却是霍布斯。从霍布斯开始,西方现代国家的宗教生活成为了精神所关注的对象,而精神属于信仰自由,在主权的管控之下,不属于最高主权可以直接干涉的部分。从罗马时代以来形成的精神和世俗合一的国家观,历经中世纪:教会是建立在信仰之上的,国家是最高级和完善的政治组织,但是国家的存在是为了实现最高的善,“为了拯救不灭的靈魂”,教会重视个人主义和强调自我救赎<sup>[7]59</sup>。霍布斯完全颠覆了这一罗马时代以来形成的观念,宗教成为了国家的手段,国家除了保护个人

安全之外别无它用。国家替代上帝成为世俗最高的主宰之后,国家就成了神话:国家就是上帝,超越了善恶的利维坦,是万能的工具和包治百病的良药。实际上,国家成为了西方社会现代性危机的根源,要反对霍布斯,走出现代危机,“就必须首次摧毁国家观念——这个现代的邪神”<sup>[7]65</sup>。也就是说,要解决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危机,就必须回归国家的初始概念,让国家成为塑造美德而不只是希图和平的工具。

## 结语

不论是阿伦特、施特劳斯、沃格林还是其他西方政治思想家,在探讨西方社会现代性危机产生的根源时,都将其归咎于西方现代社会的变化,而且其解决方案都带有明显的古典性。阿伦特和施特劳斯都将西方社会现代性危机看作是判断的危机,只不过阿伦特认为是西方现实本身的危机,而施特劳斯则认为首先是思想的危机。沃格林则从精神世界的角度解释了危机的存在。他们提出的解决西方社会现代性危机的方案,无论他们自己多么地不愿意承认,但事实上他们均从古代的思想中吸收了大量的营养,带有某种回归古典的倾向。这种在面临西方社会现代危机时所产生复古的心态,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由来已久。但是复古却不利于西方社会现代性危机的消除,毕竟我们不可能再回到古代,古代的经验和手段或许具有借鉴意义,却无法提供直接的答案,更不可能直接适用于现代。

是时候正视西方所谓的“现代性”了。西方社会现代性危机可能确实存在,其出现且有着诸多方面的原因,但是现代文明也应该得到肯定。危机在任何时代都存在,用过去的目光来反思现代性无益于寻找可靠的解决之道。西方现代社会四五百年来的发展已导致了诸多弊病,要改变也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且这种改变不仅仅要作出社会变革,还需要变革人性本身。社会的发展导致的不一定是进步,深植于社会内部和人的内心的政治组织和思想形态也不可能仅仅凭借外力就能改变。现代型社会是一个已经到来且分工合作的社会,有些人思考人之

本性和宇宙规律,有些人谋求物质享受和人身安全,但都彼此平等。对于西方人而言,罗马的荣光已经过去,中世纪的黑暗也已经成为历史,探寻一个足够安全和自由的现代,尊重和接受不同的选择,立足自足的个体去思考和解释世界,重塑现有的政治和思想概念,或许是解决西方社会现代性危机的一种可能性路径。但归根结底,如果西方社会的基本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等不进行积极的扬弃,其现代性危机终究是无法真正得到解决的。19世纪,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批判,构建了辩证而积极的扬弃思想。因此,我们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最为理想的社会形态,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从而真正而彻底地解决所谓的现代性危机。

## 参考文献:

- [1] Leo Strauss.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other studies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 [2] 埃里克·沃格林. 政治观念史稿(卷五): 宗教与现代性的兴起[M]. 霍伟岸,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 [3] 汉娜·阿伦特. 共和的危机[M]. 郑辟瑞, 译.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 [4] 卡罗勒·维德马耶尔. 政治哲学终结了吗?[M]. 杨嘉彦,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 [5] 列奥·施特劳斯. 古今自由主义[M]. 马志娟,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 [6] Eric Voegelin. 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2.
- [7] 詹姆斯·麦克亚当斯. 现代危机: 政治学评论 1939—1962 [M]. 曹磊, 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
- [8] 埃里克·沃格林. 政治观念史稿(卷二): 中世纪(至阿奎那)[M]. 叶颖,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 [9] J·F·塔尔蒙. 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M]. 孙传钊,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0.
- [10] 柯林武德. 历史的观念(增补版)[M]. 何兆武, 张文杰, 陈新,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11] Gianfranco Poggi.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State: a Sociological Introduction [M]. Palo A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 Definition of Modernity Crisis: Opinions of Arendt, Strauss and Voegelin

OUYANG Huolia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China)

**Abstract:** Modernity crisis has become a recognized proposition in the Western academia. As for the way modernity crisis in the Western society is understood, explained and solved, there are different answers. Arendt believes that modernity crisis in the Western society comes from the loss of authority in modern society. We cannot go back to the past, but can only focus on the future. Strauss tries to find an antagonistic explanation between reason and spirit, and explores the meaning of this explanation for political life, so it has a clear speculative color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Voegelin expounds the Western modernity cri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igion, and traces it back to Gnosticism of the Middle Ages, thinking that the spiritual innocence of modern people is the essence of the crisis. To solve the Western modernity crisis, we must think about its origin and give different solutions. Looking at modernity with a retro mentality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elimination of modernity crisis in the Western society. Ancient experience and methods may have reference significance, but cannot provide direct solutions, let alone being directly applied to modern times. Therefore, respecting and adopting different choices may be the solution to modernity crisis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Key words:** modernity; modernity crisis; totalitarianism; ancient and modern change

(责任编辑 雪 箫)